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中国古代人的富裕之梦

高文舍 著 周桂钿 审定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中国古代人的富裕之梦

高文舍 著

周桂钿 审定

新华出版社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中国古代人的富裕之梦

高文舍 著 周桂钿 审定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密云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插页 2 张 128,000 字

1991 年 12 月第一版 1991 年 1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ISBN 7-5011-1513-3/G·537 定价：3.50 元

序

季羨林

最近几年来，有关方面的人士提出了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口号，立即得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甚至海外华人和华裔的同声赞扬和热诚响应，足证这个口号提到了人们的心坎上，是完全正确而且及时的。

根据过去的经验，所有正确的口号都必须落实到行动上，才算有效。因此，我们中国文化书院的同仁们和东方影视集团总经理李生泉同志等，爱国不敢后人，也想尽上自己的绵薄，为这宏伟的盛举增砖添瓦，几经酝酿磋商，发起了这项《神州文化集成》大型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中间也得到了新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计划先出一百本，并将配以电视录像。读者与观者，不限于大陆上的同胞，也包括大陆以外的华人和华裔；台湾在内，自不在话下；我们甚至想象，连在历史上同中国文化交流密切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也都包括在里面。至于这个范围以外的世界上所有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国家，如果对我们的丛书和影视也感兴趣，我们当然也衷心欢迎。“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这就是我们的期望。

抱着这种想法和期望，我们开始了组稿活动。在

较短的期间内，我们约请了一些国内学有专长的老中青年的学者，承担各书撰写的任务。尽管有不少学者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一听到我们发起的宗旨，无不慨然应允。为了保证著作质量，我们规定了严格的审稿制度。谁也没有“特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弘扬我们先民留下来的优秀文化。这一点，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告诉我们的读者和观众。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最初我们想定名为《神州文化精华》或者《精粹》。但是有的同志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上来看，我们中华文化，不管有多么光辉灿烂，不管对全人类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它同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的文化一样，并不可能完全都是精华。我们的丛书中也介绍了一些非介绍不行的反映中国特殊文化的现象，它也许谈不上什么精华，但也绝非“毒品”，它似乎是中性的，绝对无害，也许还有点益处，它能增强国外读者和观者对中国的全面了解。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把本丛书命名为《集成》。

我们的丛书虽然冠以“神州”，但是我们考虑问题的视野却绝不限于神州。

最近几年来，我经常考虑一些有关文化的问题。如果说我的考虑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我并不限于神州这一个地区，也不限于当前这一个时代。我收藏着一方清代浙派大家陈曼生刻的图章，其文曰“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这完全符合我的精神。我于文化问题绝非内行里手，我也不装出这番模样。但是，我看到了一些东西，想到了一些东西，我不愿意妄自

菲薄，也不愿意敝帚自珍，于是就写了一些短文，在不同的座谈会上也做了几次发言。得到的反应多是肯定的。连一些外国学者也不例外。这当然增强了我进一步探讨的信心。

我觉得，我们过去谈论中国文化，往往就事论事，只就中国论中国，只就眼前论中国。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像瞎子摸象一样，摸不到全貌，摸不到真相。经过我多年的思考，我认为，从人类整个历史来看，全世界人民共创造出来了四个大的文化体系。所谓“大”指的是历史悠久、影响广被、至今仍然存在的文化体系。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发现了只有四个：中国、印度、伊斯兰和欧美。其中前三个属于东方文化范畴，第四个属于西方。东西两大体系，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异者更为突出。据我个人的看法，关键在于思维方式：东方综合，西方分析。所谓“分析”，比较科学一点的说法是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许多部分，越分越细。这有其优点：比较深入地观察了事物的本质。但也有其缺点：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谓“综合”就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成一气，使之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普遍联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

我浅见所及，东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即在于此。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必须了解东方文化；而要想了解东方文化，必须了解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了解必须同时并进，相互对照，相互比较，初时较粗，后来渐细，

螺旋上升，终至豁然。

我想先从医药中举一个例子。人们都知道，西医和中医是完全不同的，两者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发展过程也完全不同，因此，诊断、处方、药材等等都不一样。最明显的差别是大家所熟知的：西医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往往是头痛医脚，比如针灸的穴位就是如此。提高到思维方式来看，中医比西医更注重普遍联系，注意整体观念。

再拿语言文字来作一个例子。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特别是那一些最古老的如吠陀语和梵文等等，形态变化异常复杂，只看一个词儿，就能判定它的含义。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定它的含义，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词组中或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观念。

再如绘画，中西也是不相同的。许多学者，比如申小龙先生等，认为西画是“焦点透视”，中国画是“散点透视”。你看一幅中国山水画，可以步步走，面面观，“景内走动”，没有一个固定的焦点。申小龙还引用了李约瑟和普利高津的意见，认为汉民族有有机整体思维方式。

从上面几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特点。约而言之，这个特点可以归纳为普遍联系和整体观念。从“科学主义”的观点上来看，这未免有点模糊；但是这个“模糊”却绝非通常所谓的“不清不楚”，

而是有比较严格的科学含义，它强调的正是普遍联系。这同我上面讲的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综合”，是完全一致的。

我的这一点想法，颇得到一些学人的赞同。在北京召开的“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讲了我的看法。会议结束以后，一位日本大学教授专程来到我家，向我表示他很赞成我的意见。我最近到南朝鲜访问，在社会科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又谈了我的看法，一位大概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教授说：“我们韩国没有东方文化！”我在大吃一惊之余，举了几个我在汉城几所大学中看到的例子，说明那里是有东方文化的。那位教授最后还是承认了我的看法。

但是，不管有多少人赞成我的想法，我毕竟不精于此道。亿而偶中，是可能的；亿而不中，又何尝不可能呢？我这一点粗略的想法，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用实践来证明。即使在非常长的时间内，也只能逐渐地通过世界文化的发展来验证。这一点我想是大家都同意的。

一个人自己有了一点新的看法，而且又觉得它是可能站得住脚的，总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理解。得到赞成，当然高兴；得到否定，也可以起他山之石的作用。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像一个传教士一样，一有机会，就宣传我的“上帝”。现在就是借写这篇序的机会，再絮叨一遍。

我这一篇所谓总序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我绝无意强加于人。强加于人的作法是愚蠢的。百家争鸣，我

只是一家。但有一点我是十分坚定的，看中国文化，必须把它放在东方文化这个大框架内，放在世界文化这个更大的框架内，才能看得清楚。如果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不能放开眼光，囿于积习，墨守成规，则对我们祖国的优秀文化，无论如何也是认识不清楚的。弘扬中华文化，发扬爱国主义，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神圣的责任。我们这套丛书的每一位作者和电视录像的制作者，都会认真负责地从事自己的工作。我希望，我们的任务能够完成；我希望，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是为序。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目 录

序	季羡林
第一章 发展的主题：农商关系简论	1
一、观念效应：上帝的弃儿	1
二、冲突与变异：农商一体化的形成	5
三、财富分配的工具：货币变形态	7
四、财产关系：经济发展的瓶颈	9
五、土地集中：社会价值与经济利益的双重实现	13
六、对立或互补：城乡经济文化的差异	16
第二章 无力的呼唤：富民的经济目标	23
一、“无为”与“法自然”：经济发展的理想政治原则	23
二、“散财”与“公天下”：政府经济行为的设计	34
三、“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论富国与富民	42
四、“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论生产与分配	46
五、“轻税所以生财”：论财政功能	48
六、“欲富天下资之天地”：论理财之道	50
第三章 诱人的乌托邦：“均平”的历史地位 与作用	55
一、历史的轨迹：平均主义的产生	56

二、精神的魅力：多彩的均平主张	60
三、和谐的稳定器：土地占有均平	71
四、均平器：赋税调节效应分析	82
五、脆性结构的强调节：农民义军的“均平”大旗	94
第四章 独特的平衡机制：	
经济伦理原则	103
一、道德与宗教：东西方经济伦理观比较.....	103
二、弃恶扬善：社会选择与个性压抑.....	108
三、“义”“利”之辩：社会理性与个人选择	114
四、趋利与道德完人：人格分裂.....	118
第五章 权力的市场与价格：	
政府经济论	125
一、童年的刺激：神话与社会传统.....	125
二、目标模式：和谐与秩序.....	129
三、财富分配的陷阱：富国弱民.....	136
四、目标实现的途径：机制运用	139
五、权力魔杖：政府经济行为及其后果.....	142
六、西弗斯之谜：历史循环.....	146
第六章 封闭与开放：寻求富强之路	151
一、冲突与选择：对西方冲击的反应.....	151
二、清新的风：经济之学的兴起.....	155
三、喃喃梦呓：封闭与保守	171
四、不和谐的奏鸣：中西国情不同论	176
后记	李生泉 185

第一章 发展的主题：农商关系简论

农商关系是中国传统经济文化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问题。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历代政府一直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及传统的“农本商末”观念，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主要原因。我们意在通过农商关系的分析，揭示中国传统经济文化的重要运行机制。

任何政策和观念都有其存在及发生作用的条件。对农商关系问题的分析离不开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并在小农经济基础上耸立着的集权专制，这使农商关系问题具有了深刻的文化意义，构成了民族心理的重要内容。

一、观念效应：上帝的弃儿

纵观世界思想史，人们大都基于道德的评判标准而首先向商人发难，孜孜为利的商业行为似乎成为人类一切罪恶的渊薮。柏拉图认为，从事工商业者最下贱，亚里士多德则指出为国家服务的不应是农民，而是工商隶仆等。中世纪宗教伦理学者对商人及高利贷者的批评和攻击更是不遗余力。即

便到了启蒙运动早期，这种状况也未改观，在莎士比亚笔下我们便会看到一副苛薄、吝啬甚至残忍的商人形象（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经济伦理的基本倾向可从人们对商人的古老断语中露出端倪：“商人从来得不到神的欢心”，马克斯·韦伯指出：“他可能没有犯罪的行为，但是不会合乎上帝的心意。这一原则一直到十五世纪还是有效的，但是修改这项原则的第一个尝试在经济关系变化的压力下已经在佛罗伦萨慢慢地成熟了”（马克斯·韦伯《世界经济通史》第三〇三页）。新型的经济关系终于把商业抬上独尊的地位。世界市场便在商业的濡浸之下日渐成熟，商业的发达、成熟及相应的制度保证最终表现为变动不居的经济社会的突出特点。

在中国古代，人们并不把农业和商业绝对对立。相反，商业作为基本的行业而与农业相辅相成，有所谓“无商不通”的说法，商人仍属“士农工商”等“四民”之列。商业的职能在于交通聚散，平抑经济，稳定社会。《虞书》载有“懋迁有无化居”，《周书》亦载“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食物、木材、制品）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史记·货殖列传》），史籍中有关劝民各守其业，各成其事更是屡见不鲜（《左传·闵公二年》“务林、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国语·周语上》“庶人工商，各守其业”。《左传·宣公十二年》“商农工贾，不败其业”）。

春秋战国时，诸侯称雄，连年战乱，农业生产必为人们所注目，“重农”为诸国的基本国策。据罗根泽先生的考证，中国“农本商末”观念始于战国末，盛行于西汉初（罗根泽《诸子考索》第一〇六——一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二月）。

众所周知，秦国以“农战”为既定国策，因为“工商众则国贫”（《荀子·富国篇》），秦终于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汉承秦制，并致力于建立农业文明的文化体系，而商业的发展、商人的活跃却在动摇着这一体系的建立。工商业的发展自然导致人们“背本而趋末”，必然出现“淫侈之俗，日月以长”（《贾谊集》第二〇一页，《论积贮疏》），而商人“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所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晁错《论贵粟疏》），其结果便是“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晁错《论贵粟疏》）。私商的兴起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威胁，迫使人们在农商之间进行艰难的选择。中国思想家对商人的发难，或国家抑商政策的执行，主要立足于“农本”这一基本点，所谓“农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样，留给我们的深刻印象是利令智昏、苟苟营利的商人自然违反了社会和谐的原则，把人们的行为引向勾心斗角的渊薮，污染了农业社会纯朴的社会风尚。

总而言之，商业社会中所强调的个人体验或个体的活动意识和农业社会中温情脉脉的伦理规范格格不入。尽管东汉王符曾指出农工商各有本末，唐代崔融、韩愈，宋代陈耆卿，明代黄宗羲等把商人提到与农民同等重要的位置，或者指出“农商皆本”、“万商废业则人不聊生”（崔融），并公开为商人的谋利行为辩护，认为商人和农夫一样具有积累财产的权利，但这些看法不只是在古代，即便在近代也未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旋律，当然也不可能成为政府大力发展商业的理论依据。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称“重农抑商”是政府的政策，它实际反映了农业社会深厚的文化传统，它能够满足人们追求和谐

稳定的价值要求，这一价值准则积淀为人们的心理结构，又自觉不自觉地在人们的 behavior 中表露出来，极为重要的是政府在这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衣丝履绮，食必粱肉”的商人向人们施展其独特的魅力时，出现的便是汹涌的弃农经商潮流，它从根本上动摇着支撑整个帝国大厦的基石。政府无疑会动员一切力量采取严厉的防范措施，如汉代政府便规定商人“不得衣丝履绮”，子孙也不得为官，并且“重租税以困辱之”（《汉书·食货志》），西晋政府曾令商人“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太平御览》卷八二八），在人格上进行污辱。社会心理的压力与政府政策的限制使得中国商人进行了一种异乎寻常的选择：他们的货币积累并不是投向新的产业，而是“求田问舍”，这是他们在夹缝中所能进行的唯一选择。这一生存哲学恰恰又证明了农耕文明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同时又表现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及商人的畸型态，它（他）们自身再也没有能力冲破传统的羁绊而终于沦为封闭、稳定的农业社会的附庸。

由此可见，有关“本”、“末”、“农”、“商”问题旷日持久的争论最终归之于文化价值目标的差异。在这一较量中，政府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政策要么直接限制商业的发展，要么以“均输”、“贡纳”等形式弱化商业的功能和活动范围，要么以“官工商”的方式抑制民间工商业的发展。王建《织锦曲》：“大女身为织锦户，名在县家供进簿……一梭声尽重一梭，玉腕不停罗袖卷……合衣卧时参没后，停灯起在鸡鸣前。一匹千金亦不卖，限日未成官里怪”（《全唐诗》卷三九八）。因而，中国的商业和市场的发育先天不足，政府的行为决定着市场的废置和拓展（唐以前尤为如此）。经济并无内在

的冲动力，因而其纵横捭阖的能力几乎丧失殆尽。这一政府活动“嵌入”的非自然发展过程，使得中国经济走上了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道路。在西方，当商人阶层以全新的面貌活跃在社会经济舞台的时候，而中国商人还未脱离农民的襁褓；当西方的城市作为农业社会的异己力量，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时，中国的城市却成为旧的社会经济组织的最后堡垒。当我们为古代严密的市场管理系统而骄傲时，我们却很少注意到这样的事实：政府严密的市场管理体系及对交换品的限制，既隐含着皇权的绝对权威，又表明交换活动或市场成为政府政治活动的重要领域之一。

二、冲突与变异：农商一体化的形成

在农、商领域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的冲突，并未演化为农商的根本对立，恰恰相反，中国的商业却以畸型的面目出现，成为农业的附属物，特定的文化氛围阻碍了商业的正常发展，商人也从未因其经济实力登上政治舞台，商业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冲动也未诱发出政府新的行为，特别是商业意识和价值准则并未被社会所认可，这便决定了社会经济封闭和僵化的基本特征。

商业的兴盛和发展程度从根本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经济的扩张力，商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并不仅仅停留在维持生存的水平上，而是以盈利为目的，其风险意识和开放意识是其它阶层无与伦比的。他们的视野无疑在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的商业活动中不断开阔，其开放式的思维定势也在见多识广中逐

渐形成，因而较强的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成为商人的主要特征。

在商业社会中，利益的追求与冲突必然会出现一种“平衡”的局面，当亚当·斯密把人人追求物质利益作为“看不见的手”而发生作用时，自然表现为整个社会潜力的充分发挥。它向人们展现了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一动力在农业文明中无疑被打上“恶”的烙印，然而，正是这种“恶”，才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增强了经济的扩张力。

中国古代政府对商人的抑制措施，使得他们与土地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促成了中国社会“农商一体”的独特形式。经济的内在动力转化为对土地的大量兼并和掠夺，流离失所的农民成为社会动乱的主要因素，尽管历代朝廷对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作了种种努力，但深刻的文化背景及单一农业生产结构的作用或运行，使得政府的努力显得绠短汲深。尤为重要的是政府抑商重农的政策本身恰恰又是造成兼并的主要原因。

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被置于政府的羽翼之下，很难有自己独立发展的机会，当然无力冲破农业社会传统的社会组织，创建新的社会结构。商业社会中通行的经济利益调节原则被政府的行政干预取而代之，而政府调节却因缺乏必要的弹性而常常使商业和市场萎缩。政府往往在发展商业和打击富商大贾的两难选择中扭曲了市场，市场仅仅成为农业文明中家庭手工业的有限延伸。

一般来说，家庭手工业是农产品商品化的重要条件，这种手工业者在形式上已同商人没有什么区别。约翰·希克斯指出：“为市场而生产的手艺人就是商人，他先买进后卖出，